
潮汕“婆娘”的歌册人生

——潮州歌册的女性口述史研究^①

刘文菊*

^① 基金项目：“潮州歌册与潮汕女性文化研究”2011潮州市社科规划项目（2011-A-08）；2011广东省社科规划项目（GD11XZW02）；2012广东高校人文社科项目（2012WYXM_0042）。本文所使用的调查数据和口述史材料是本课题组师生共同调研的成果，在此向陈俊华、李坚诚、吴榕青等老师和多名学生谨表谢忱。

* 作者简介：刘文菊，1968年生，湖北郧西人，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摘要：潮州歌册是女性化的潮汕民间文化形态，具有突出的女性文化色彩和浓郁的潮汕“姿娘”味道。潮汕女性与歌册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歌册对女性的各个人生阶段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女性的个体生命史见证了歌册的兴衰史。清末民初至20世纪50年代是歌册发展的繁荣时期，影响了20世纪10年代到40年代出生的女性，她们是歌册最具代表性的传承群体。

关键词：潮汕姿娘；潮州歌册；女性口述史；调查研究

一、引言

潮州歌册（以下简称歌册）是一种曾经流行于广东潮汕地区的传统曲艺，用潮汕方言徒口演唱。歌册起源于潮汕地区，并向广东梅州市的丰顺县、大埔县，汕尾市的陆丰市、海丰县和福建漳州市的东山县、诏安县、云霄县以及台湾南部、澎湖列岛等地辐射，同时传播到海外潮语华侨居住地区。歌册盛行于清末至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后逐渐衰落，现已濒危。潮州歌册于2007年列入广东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

歌册作为一种自娱互乐的民间说唱艺术，具有突出的女性文化色彩和浓郁的潮汕“姿娘”^①味道。从传唱主体来看，虽然歌册的创作者主要是落第秀才、失意文人、账房先生、教戏先生等知识男性，但是，歌册的歌唱者（以下简称歌手）多数是女性，听歌册的群体也是妇女和儿童，成年男性鲜有介入。从传唱空间来看，歌册主要是在庭院、绣房、“姿娘仔间”^②等女性空间流传，与女性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从传承方式上来看，歌册主要是通过家庭成员中的女性谱系代代口耳相传。多数女歌手在童年时期听女性长辈唱歌册，到了青少年时期就跟着她们学唱，成年以后再教会下一代女性。歌册是潮汕姿娘学习、生活、娱乐、休闲的精神乐园，成为女性化的潮汕民间文化形态，因而被称为“潮汕妇女的百科全书”、“潮汕女子文化”、“潮汕女书”、“潮语区女性文学”、“闺中文学”等。20世纪90年代已有不少研究者

① 姿娘：潮汕人把女性称为“姿娘”，未婚女性叫“姿娘仔”，老年女性叫“老婆娘”。

② 姿娘仔间：在潮汕地区子女众多的家庭里，女孩子们通常没有属于自己的小空间。同村中几个或十几个年龄相仿的年轻姑娘，便结伴借用或租用一间空置房子，作为她们暂时专门用来做手工、聊天和休息的场所，当地人称之为“姿娘仔间”。

从女性的视角研究歌册，如陈觅、郭华^①、余亦文^②、林长华^③、时之^④、庄群^⑤、陆小玲^⑥、林瑜^⑦、肖少宋^⑧等，多属概略论及，尚需对歌册的女性文化含蕴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和阐释。

歌册是独特的女性文化景观，对潮汕女性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伦理观、婚恋观、性别观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女性与歌册有着天然的联系，她们是歌册传承的主体，与歌册的兴衰发展密切相连。探寻歌册与女性之间有何种联系，二者又是如何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女性口述史研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李小江认为：

妇女史与口述史具有天然的盟友关系。……口述史对传统史学有着补充和校正的作用，它发掘了沉默的人群（如妇女、少数民族、社会底层）和人们沉默的声音（关于私人情感、生命体验等），使得史学有可能更完整地记录“人”的和普通人的历史。^⑨

采用女性口述史方法研究歌册，在民间寻访经历了20世纪近百年社会发展的女歌手，“让歌册女性自己说话”，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各个生命时期传唱歌册的历程，寻找歌册与女性生命史的联系；“发出歌册女性的声音”，让她们再次唱响熟悉的歌册，讲述歌册对她们的人生所产生的影响，寻找女性与歌册兴衰之间的联系。

二、潮州歌册的女性口述史调查

2011年7月到2013年3月，我们深入到曾经流行歌册的潮汕地区及周边区域，寻找民间歌手进行口述调查，记录她们独特的生命历程和传唱歌册的历程。

① 陈觅、郭华：《潮汕妇女与潮州歌册》，《国际潮讯》1990年第12期。

② 余亦文：《潮汕女子文化——“潮州歌册”》，《广州潮讯》1997年第2期。

③ 林长华：《奇特的女书——东山歌册》，《侨园》2010年第6期。

④ 时之：《潮州歌册，潮州妇女的百科全书》，《中国文化报》，2001年5月17日。

⑤ 庄群：《潮州歌册在海外》，《潮人》2003年第1期。

⑥ 陆小玲：《潮州歌册传承中的女性意识》，《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⑦ 林瑜：《口述历史：旧日的潮剧与潮州歌册——采访祖母、外祖母与婶婆》，《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⑧ 肖少宋：《潮州歌册中的女性形象》，《广东艺术》2012年第1期。

⑨ 李小江：《女人的历史记忆与口述方法》，《光明日报》，2002年8月6日。

（一）调查内容

调查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口述个人生活经历，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和人生各阶段的生活状况；二是口述传唱歌册的经历，包括学唱时间、学唱方式、传唱的频繁期和低落期等；三是演唱记忆深刻的歌册。

（二）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是潮汕地区及周边区域会唱歌册的老人。本次调查共寻访到 38 名歌手。其中，女性 34 名，男性 4 名。专业歌手 2 名（柯秉智和翁楚钿），原生态歌手^① 36 名。目前，民间存世的女歌手居多，男歌手很少；原生态歌手居多，专业歌手很少；受保护的传承人少（只有柯秉智和林少红在 2008 年被评为广东省级歌册传承人），大多数歌手未被发现和受保护。

（三）调查地区

调查地区是潮州、揭阳、汕头、汕尾四市。38 人中，潮州市 14 人（湘桥区 6 人、饶平县 6 人、潮安县 2 人），揭阳市 8 人（揭东县 7 人、普宁市 1 人），汕头市 11 人（金平区 1 人、潮阳区 2 人、潮南区 1 人、澄海区 7 人），汕尾市 5 人（东海镇 1 人、碣石镇 3 人、甲子镇 1 人）。38 人中，8 人来自城镇，30 人来自农村。目前，在村镇寻访到歌手的机会大于城镇。

（四）年龄情况

38 人的平均年龄为 79 岁，其中，年龄最大的是 100 岁的林妙琴，年龄最小的是 40 岁的黄素英。38 人中，唱得好、唱得多、唱得痴迷的是那 30 名出生于 20 世纪 10—40 年代的 70 岁以上的女歌手。

（五）受教育情况

38 名歌手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具有小学以上文化水平的有 6 人。男歌手中，柯秉智和方汉狮是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吴贤某和苏永城没上过学，也不识字，唱歌册全靠背诵。34 名女歌手中，4 人具有小学以上文化水平，16 人断断续续上过 1~3 年的学堂，14 人从未上过学，其中有 10 人因家庭贫困无法上学，4 人因家庭观念守旧而没有上学。34 人中有 12 人是通过唱歌册学会识字的，有 2 人不识字，唱歌册全靠背诵。

（六）婚姻和家庭情况

从家庭情况来看，34 名女歌手中，多数人出自儿女众多的贫穷家庭，自幼失去上学机会，在家务农和做手工。如歌手郭美璇有 10 个兄弟姐妹，蔡玩

^① 原生态歌手：指采用原生态唱法唱原生态歌册的歌手。原生态歌册是民间广泛流传的原汁原味的歌册，原生态的唱法是一种原始的未加工过的传统唱法。

莲、徐瑞娟、林赛琴、林玉霞有9个兄弟姐妹，其余人至少有3个兄弟姐妹。从婚姻情况来看，女歌手的平均结婚年龄为21岁，最早的是16岁，最晚的是26岁。除了李素兰是招赘以外，其余人都是出嫁到男方，都属于包办婚姻，多数人的婚姻生活稳定平和。从婚后生活状况来看，多数人是子女众多，家务繁重，忙于生计，没有闲暇时间唱歌册。许舜斌育有8个子女，林妙琴、郭美璇、李逸贞均育有7个子女，其余人普遍都是五六个子女。

（七）学唱歌册的年龄

多数女歌手都是在22岁以前开始学唱，唱歌册最痴迷、最频繁是在14~22岁之间的姿娘仔时期。也有少数人的情况不同，如林少红在婚后第3年，21岁左右的时候，因丈夫去海南工作，她住回娘家跟母亲学歌册，唱给失明的奶奶听。曾惠英和郑兰英在40岁左右的时候，子女长大成人，空闲时间较多，开始跟邻居老人学唱。

（八）学唱歌册的对象

学唱对象一般是亲人或女性邻居，她们在幼年时听奶奶、外婆、母亲、婶婶等女性长辈唱歌册，在青少年时期开始跟着学唱，成年后再传唱给下一代女性，主要是通过女性谱系代代相传。多数女歌手表示，最能激发学唱兴趣和带来乐趣的还是在姿娘仔间里跟同伴一起相互学唱。

（九）歌册的传唱方式

常见的传唱形式是一人主唱，众人围坐在一起边做家务或手工，一边听唱，三三两两，三五成群，或者数十人，多至三四十人，规模有大有小。传唱的空间主要是女性日常生活的区域，有庭院、厅堂、房前屋后、村头树下、姿娘仔间等地点。传唱的时间主要是在晚饭后闲暇的时候，有时候也在中午短暂休息的时候。对年轻女性而言，更多的是晚上聚集在姿娘仔间边做手工边唱，已婚女性大多在睡前唱给子女和家人听。也有不同的情况，如李素兰以挽面^①为生，主要是边做挽面边唱；陈妙云边走街串巷贩卖鸡蛋边唱；唐秀嫻在抽纱厂边做工边给同伴讲歌册；吴秀钗是在晚上给丈夫讲歌册。

（十）歌册的演唱者

歌册的演唱者多数是业余爱好者，不是职业歌者；以唱歌册为谋生手段的一般是走村串户的行乞者，他们靠唱歌册换取少量钱粮物品。主唱者通常是人群中公认的优秀者，她们义务为大家唱歌，不收取报酬。不过，她们通

^① “挽面”又称“开脸”、“界面”、“修容”，是一种流传于潮汕民间，用纱线拔除脸上汗毛的古老美容方法。

常会受到听众的爱戴，并且能获得众人的尊重和回报。如李素兰在庭院里给邻居唱歌，灯油费由听歌册的邻居分摊，年轻的姑娘还自愿帮她做家务，连倒马桶这样的脏活都愿意干。

（十一）传唱的歌册曲目

受访人会唱的歌册共有 100 多部。主要是传统歌册，如《双鸚鵡》、《玉如意》、《玉簪记》、《秦凤兰》等，也有少量革命歌册和新歌册，如《江姐》、《红灯记》、《新潮州八景》等。从歌手即兴演唱的歌册来看，唱得最多的是《百屏灯》、《玉如意》、《狄青》、《杨令婆辩本》、《宋仁宗叹五更》。其中，《百屏灯》最为流行，几乎人人会唱，而且还能讲述其中的人物和故事。在广为传唱的歌册中，有《百屏灯》、《百花名》、《百草名》、《百鸟名》等普及百科知识的短小歌册；有《宋仁宗叹五更》、《岳芝荆思五更》等按照时间顺序推进故事情节、便于记忆的歌册；有《玉如意》、《狄青》、《杨令婆辩本》等故事性、趣味性强的歌册；也有《英台行嫁》、《十二月歌》等以爱情婚姻为主题的歌册。

三、潮汕女性生命史中的歌册

从访谈的口述史材料来看，歌册对男女歌手影响的程度完全不同。歌册跟男歌手的人生发展关联不大，但对女歌手的各个人生阶段都有着明显的影响。在 14~22 岁的姿娘仔期间，她们对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的歌册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甚至达到痴迷的程度。加之，未婚女性没有太大的家庭负担，空闲时间较多，这一时期成为她们唱歌册最频繁的时期，歌册对她们思想观念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多数歌手在婚后忙于生儿育女，加之儿女众多，家务繁重，渐渐进入唱歌册的低落时期。歌册对女性产生的影响和作用随着她们结婚前后生活境况的变化而发生起伏。这种独特的文化传承方式，体现了鲜明的女性文化色彩。

（一）婚前：唱歌册的频繁时期

（1）歌册是潮汕女性的启蒙课本。对于多数因家贫无法上学的女性来说，唱歌册是她们识字和学习文化知识的最佳途径。虽然她们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但是学会了大量歌册，跟“饱读诗书”的文人一样充满了自信。李素兰说：“我担了一箩筐的歌仔。”郭美璇、李逸贞、翁慧花和林玉霞也都说：“我有一肚子的歌仔。”歌册寓文化教育于说唱之中，让女性既学会了认字，又提高了文化水平，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扫盲启智的教育功能”^①，

^① 袁尔纯：《潮州歌册的社会教育学阐释》，《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 年第 5 期。

这也是歌册广泛流传、深受勤奋好学的潮汕女性喜爱的重要原因。

蔡丽娇说：

解放前的女孩子命运不太好，耕田的人家没有女孩子能去读书的。我会识字和写字主要是因为唱这些歌册，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我爹。因为自己喜欢就很刻苦，有时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点一盏油灯放在桌子上，拿着一本歌册看，一直看到睡着了。^①

林妙琴说：

我跟邻居老人学唱，没有专门教的老师。邻居老人白天织布，晚上唱歌册。她唱歌册的时候，我就在她后面看着，看着看着就会了。我虽然没读过书，但通过唱歌册就认识了很多字，知道很多故事。^②

(2) 歌册是潮汕女性的教科书。歌册故事大多贴近女性的生活感受，能使她们产生强烈的共鸣，起到了一定的道德教化、伦理束缚、行为规范的作用，成为女性的生活教科书。歌册大多带有民间朴素的思想观念，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有劝善的作用。唱歌册对潮汕女性人生观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甚至会影响到她们的人生发展。

陈妙云说：

歌册就是仁、义、礼、智、信，教导人行孝，教导人聪明，教导人不能做坏人，教导人心胸放宽。歌册是特别的，里面有忠臣，有小人，也有坏人等。唱歌册非常好，吐旧纳新，凡事看开，能治百病。我现在世事看开，有啥是歌册里没有的？^③

翁慧花说：

歌册里面就包含劝世文的，都是劝人为善，扬善惩恶。对歌册入迷的人来说，做人必须正直。我这个人从小就很喜欢歌册，坏事我干不了。^④

① 口述史料：蔡丽娇（1935— ），女，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观一村，2012年2月调查。

② 口述史料：林妙琴（1913— ），女，汕头市澄海区莲华镇隆城村，2012年3月调查。

③ 口述史料：陈妙云（1936— ），女，汕头市澄海区溪南镇上岱美村，2012年1月调查。

④ 口述史料：翁慧花（1939— ），女，汕头市金平区鮑江街道，2012年1月调查。

(3) 歌册是潮汕女性的精神乐园。潮汕女性素以勤劳能干、聪慧贤德而闻名，在姿娘仔时就能独当一面，干农活、做手工、做家务等。她们通常是白天干活，晚上在姿娘仔间边做手工边唱。唱歌册是她们最重要的休闲娱乐方式，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了乐趣。多数女歌手对歌册十分痴迷，即使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也经常夜以继日地学唱。学唱过的歌册刻骨铭心，化成生命记忆中的一部分，终生都不会遗忘；即便是在几十年后，有些长达一两万字的歌册仍能倒背如流。

徐瑞娟说：

我们是一边绣花一边唱歌册，中午和晚上都挤出时间来唱歌册。虽然中午干完农活回家特别累，但也要争取时间唱歌册解乏。晚上一回到家马上就跑到姿娘仔间去唱。几十年前条件很苦，房间里连灯都没有，连买煤油的两毛钱也没有。晚上唱歌册只是点一支香，一个字一个字地照过去，简直是痴迷呀！那时学会了很多歌册，有时同伴还会在一起比赛唱歌册，多高兴啊。^①

(二) 婚后：唱歌册的低落时期

与有闲暇唱歌册的姿娘仔时期相比，婚后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婚前频繁痴迷的唱歌册时期逐渐低落下来。多数人婚后因忙于生儿育女，子女众多，负担加重，无暇再唱。有一部分人因婚后失去了传唱的氛围而减退了唱歌册的热情。不过，也有一部分人因婚后生活环境较好能继续唱歌册。

多数歌手忙于生儿育女，无暇唱歌册。因受传统“多子多福”思想观念的影响，绝大多数女歌手不仅出生于子女众多的家庭，自己在婚后的家庭也是儿女成群。30名70岁以上的女歌手中，平均生育5个儿女，其中，有4人生育了七八个儿女，16人生育了4~6个儿女。她们在整个长达二十年的盛年时期基本上都在忙于生儿育女，且家务繁重，根本无暇唱歌册。

许舜斌说：

我在17岁时会唱歌册，白天割草，晚上钩花。当时点一个油灯，在庭院里大家坐成一圈，我们小孩子和年轻人钩花，老人没有钩花的就唱给我们听。但18岁结婚后，先后生了8个孩子，一大家人要吃饭穿衣，一年到头忙个不

^① 口述史料：徐瑞娟（1934— ），女，揭阳市揭东县新亨镇北良村，2012年2月调查。

停，哪有时间唱歌册。^①

郑妙斌说：

我从小就喜欢听歌册，有一群老太太下午没事就坐在门口唱歌册，歌册本一拿出来人都来听了，有事的做事，没事的就唱给别人听。结婚后，生了5个孩子，丈夫是村长，忙于工作，还经常出门在外。我在家里耕种，还有这些孩子，惨到要死，哪有闲暇，偶尔有空才能唱。^②

有少数生育较少的女歌手婚后仍能持续唱歌册。如晚年回乡的陈惜卿，曾在香港居住近50年，以刺绣为生，没有生育，闲暇时间较多，经常唱歌册。林赛琴婚后仅生育2个女儿，以教书为生，业余时间不仅能唱歌册，还能自创歌谣。

也有一些女歌手由于婚后经济状况较好，闲暇时间较多，能够持续唱歌册，如李素兰、洪秀云、蔡玩莲、陈惜卿、徐瑞娟、林赛琴、林玉霞等人。可以说，经济条件的好坏是影响婚后能否持续唱歌册的重要因素之一。

林玉霞说：

我娘家是做鱼露生意的，家境比较富裕，我有钱买歌册本来唱，也不需要出门干活，所以经常可以跟老人学唱歌册。我结婚后婆家的经济条件也很好，晚上还有空闲跟邻居一起唱歌册。^③

还有因为家庭环境发生变化，部分歌手减退了唱歌册的热情。有些歌手因为婚后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生活环境，对夫家的人不甚了解，左邻右舍也很陌生，昔日的同伴又各自出嫁，没有了熟悉的听唱人群，慢慢就减退了唱歌册的热情。即便想要唱歌册，但又受到各种束缚，无法自由自在地唱歌，正如一首潮汕歌谣所唱：

客厅唱歌哩畏人，房内唱歌哩畏翁，灶前唱歌畏司命，坐落尿桶唱够双。^④

① 口述史料：许舜斌（1932— ），女，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东和村，2012年3月调查。

② 口述史料：郑妙斌（1929— ），女，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头冲村，2011年11月调查。

③ 口述史料：林玉霞（1942— ），女，潮州市饶平县海山镇美宅村，2012年1月调查。

④ 林朝虹、林伦伦：《全本潮汕方言歌谣评注》，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年，第287页。

林银花说：

以前姿娘仔间的那些姐妹都嫁人了，相隔很远，每到正月里，大家回娘家见到了，就会聚一聚唱唱歌。过完年大家就各自忙自己的，家庭负担太重了，家庭都理不过来，没有心情唱歌册。^①

传统女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不高，举止行为都要受到约束，家人的支持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婚后唱歌册的热情。有不少歌手就是因为婆婆和丈夫的反对而不能再频繁唱歌册。

翁慧花说：

我唱歌册最频繁是从16岁开始的，到20多岁开始理家了，家务很繁重，就没有心思和时间去唱了。婆婆和丈夫都不喜欢听歌册，我一唱歌册，丈夫就骂我。丈夫要是去看守鱼塘，我就可以唱个够。不过，晚上看歌册的时候得点上一盏灯仔，不能让别人看见。^②

也有一些歌手的家庭环境比较宽松，婆婆和丈夫比较支持唱歌册。如吴秀钗、蔡丽娇、陈妙云等。可以说，家庭环境的好坏也是影响婚后是否能持续唱歌册的重要因素之一。陈妙云说：

因为婆婆疼爱，我婚后不用怎么理家，空余时间比较多。虽然没什么钱可以买歌册，但邻居朋友知道我会唱歌册，都跑来听，还千方百计想办法借到歌册本来给我唱。有时为了第二天能唱歌册给别人听，我就前一夜抓紧时间看歌册本。

吴秀钗说：

我爱唱歌册，经常是整夜整夜地唱歌册、讲歌册。我那口子第二天就会跟人说：“我家某人啊，昨晚唱了一夜的歌册啊，第二天都不犯困的。讲了那么多的歌册里的历史典故居然没有一个错漏的。”我那时候简直是痴迷啊！^③

① 口述史料：林银花（1928— ），女，潮州市饶平县海山镇美宅村，2012年1月调查。

② 口述史料：翁慧花（1939— ），女，汕头市金平区鮑江街道，2012年1月调查。

③ 口述史料：吴秀钗（1924— ），女，潮州市饶平县三饶南联村西平路，2012年7月调查。

四、潮汕女性与歌册的兴衰

潮州歌册对潮汕女性的人生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传唱主体的女性与歌册的发展历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调查情况来看，出生于20世纪10—40年代的女性传唱人群推动了歌册的发展，她们的个体生命史见证了歌册20世纪近百年的兴衰史：20世纪10—50年代，她们处于姿娘仔时期，闲暇较多，传唱歌册最为频繁，歌册的发展处于兴盛时期。20世纪60—70年代，她们结婚生子，儿女众多，生活困顿，传唱歌册处于低落时期，歌册的发展逐渐衰落。20世纪80年代以后，歌册受到重视和保护，但因歌册赖以生存的传唱人群逐渐减少传唱空间逐渐缩小，这一传统民间说唱艺术正濒临消亡。

（一）20世纪10—50年代：歌册的兴盛时期

20世纪10—50年代，从传唱人群、传唱空间和传唱题材来看，歌册的发展均处于兴盛时期，成为流行的女性文化形态。出生于20世纪10—40年代的潮汕女性恰逢“歌册盛世”，在这个群体中产生了一批歌册传承人，本次寻访到的30名70岁以上的女歌手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从传唱人群来看，歌册传唱人数众多，是女性群体性文艺活动。在传唱人群中，有空闲时间较多、乐于教唱的老年女性，有天真好奇、乐于听唱的少年儿童，有富有活力、乐于学唱的姿娘仔，也有忙里偷闲、偶尔听唱的中年女性。传唱的主力军是女性，蓬勃向上的青年女性群体是推动歌册发展的生力军。歌册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成为盛极一时的女性化民间说唱艺术。出生于1935年的蔡丽娇是歌册盛行时期的见证者，她说：

那时的女孩子没有读书，全村子的女孩子都没有读书。一群人闲下来就一起唱歌册，大家都不认识字，但是一学就都会唱。大大小小，至少八九个人，围坐在一起，一人一段，有时候大家会的就一起唱。我们家在村子的外围，有个很大的庭院，晚上月亮很亮，一群人要么一起玩“跳鸡仔”^①，要么一起唱歌册，特别有趣。^②

从传唱空间来看，歌册传唱极为方便，是女性生活的一部分。歌册的传

① 跳鸡仔：潮汕儿童常玩的一种游戏。

② 口述史料：蔡丽娇（1935— ），女，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观一村，2012年2月调查。

唱渠道非常通畅，无论是在住宅庭院、村头树下，还是在田间地头、纱厂绣房、姿娘仔间，到处都能听到唱歌册的声音，唱歌册成为这一时期的女性风尚。凡是女性生活、劳作、休闲的地方，都是传唱歌册的舞台，并且舞台上的主角是不同年龄、不同群体的女性。张淡香家族中的三代女性都与歌册密切相连，她说：

那时候唱歌册的都是女人，男人有男人的事情干。我奶奶会唱歌册，家里没米煮饭了，邻居阿姆就叫奶奶去给她唱歌册，一部歌册从头唱到尾，她就会给奶奶一些米。我妈妈也会唱歌册，经常白天出去给别人唱，晚上回家有时间才给我们唱。我奶奶曾经做过出租歌册的生意，她从城里的店铺把歌册租回来，再转租给村里喜欢唱歌册的人，就有钱赚。有段时间奶奶生病了，就叫我去帮她出租歌册。我后来也做过一段时间出租歌册的生意，当时保存了70多部歌册，现在只剩下几本了。^①

从传唱题材来看，流行歌册的主题以反映女性生活为主，是女性审美需求的体现。流行歌册的主题贴近女性的生活，富有时代色彩，情节曲折复杂，人物栩栩如生，语言优美生动，符合女性的审美需求，故而能产生极强的吸引力，成为流行的女性文化。在广为流传的歌册中，有的演绎了忠臣良将抗击外侮、忠君报国的故事，塑造了女性心目中的理想男性形象，如《万花楼》、《五虎平西》、《平南蛮全歌》中的狄青、包拯、杨宗保、杨文广；有的演绎了巾帼英雄带兵征战、建功立业的故事，塑造了令人仰慕的女性人物形象，如《十二寡妇征西》中的杨门女将、《杨令婆辩本》中的杨令婆、《梨花征西》中的樊梨花、《秦凤兰忠义亭》中的秦凤兰；有的是演绎了女性大胆追求自由恋爱和幸福婚姻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女性的爱情婚姻理想，如《古板苏六娘全歌》中的苏六娘、《英台行嫁》中的祝英台、《海门案》中的杨牡丹。

（二）20世纪60—70年代：歌册的衰落时期

多数女性结婚成家之后，在家庭角色的转变、生活负担的加重、传唱环境的变化等个人因素的影响下，由婚前唱歌册的频繁时期转向婚后的低落时期。当然，在政治体制的转变、三年大饥荒的灾难、“文革”的浩劫等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她们也无可奈何地舍弃了歌册。在各种合力因素的作用下，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歌册的发展逐步由盛转衰，60—70年代歌册逐渐衰落。

^① 口述史料：张淡香（1924— ），女，揭阳市揭东县月城镇棉样乡美围村，2013年2月调查。

女性婚后家庭角色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歌册的发展。在广东流行一句民谣：“娶妻就娶潮汕女。”潮汕女性对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模式有着很高的认同度，贤妻良母这一性别角色对她们来说几乎是“天职”，婚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在家庭中也是“理所当然”，为了打理好家务而放弃唱歌册的兴趣和爱好更是“义不容辞”。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尽管歌册仍然在流行，但并未产生新的传承人群。同时，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产生的一批歌手在这一时期陆续结婚生子，进入唱歌册的低落时期。生活环境的变化使歌册失去了原有的传唱环境和产生新歌手的土壤，导致传唱人数的减少。尽管有一部分女性仍然能够在婚后持续唱歌册，但是歌册总体的发展趋势已经由盛转衰。

从外在因素来看，政权的更迭、三年大饥荒和“文革”等也进一步加速了歌册的衰落过程。大饥荒时期，底层家庭陷入极度贫困之中，温饱问题尚且不能解决，唱歌册更是一种奢望。

郑妙斌说：

大饥荒的年代，全家7口人只有六七两米，用一个三十二公分的大锅煮一大锅粥，熬到很烂很稀来吃，稀到一点米粒也没有，喝到饱就是了。经常饿到走不动路，生活那么苦，哪还有心情唱歌册？^①

“文革”期间，歌册被批为“四旧”、“媚歌”、“媚曲”，没人敢公开唱歌册，民间收藏的歌册本也大量被毁。

洪秀云说：

“文革”的时候，老的、旧的东西全都被烧掉，都要消灭掉，那些店铺里卖的和出租的歌册最后都被烧掉了。村里有个老富嫂家里歌册成堆，老人身体不好，整天唱歌册，老人们很喜欢，整天去听她唱，到“文革”的时候，她的歌册也一样被烧掉了。^②

不过，“文革”期间也有不少人仍然偷偷地坚持唱歌册。徐瑞娟在别人都把歌册本拿去烧掉时，偷偷把歌册本藏起来，悄悄独自哼唱。林妙琴从火堆里、溪水里、垃圾堆里寻找被毁坏的歌册残本，悄悄收藏在一个破旧的箱子里。现在，她把这些歌册当作珍宝一样，有太阳的时候就把“百宝箱”里的

① 口述史料：郑妙斌（1929— ），女，汕头市澄海区东里镇头冲村，2011年11月调查。

② 口述史料：洪秀云（1924— ），女，潮州市潮安县江东镇仙洲村，2013年3月调查。

歌册本拿出来晒一晒，唱一唱。陈妙云一家人经常关起门来躲在家里唱歌册。

陈妙云说：

我们一家人啊，一直在唱歌册。“文革”时不让唱歌册，说是毒草，本子全被烧了，那时家里所有的歌册我都不要了。不过，不让公开唱我们就关起门来偷偷唱。我儿子每次听完歌册，就开玩笑说：“刚才听了歌册中毒了，现在我们每人去冲碗红糖水来喝，解解毒。”^①

（三）20世纪80年代以后：歌册的濒危时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数女歌手在经历了四五十年的艰辛忙碌之后，生活境况渐渐好转。儿女长大成人，家务减少，家庭负担减轻，空闲时间也多了起来，她们就想再唱歌册。但是，歌册的传播环境已经改变，没有了传唱的人群，没有了歌册本，没有了唱歌册的氛围，更找不到新的歌册传承人，无法再回到昔日的歌册盛世。20世纪80年代以后，歌册已经退出了女性的日常生活，总体走向衰落。

传承人群日益减少，老一代歌手成了“歌册活化石”。目前，民间存世的歌手主要是70岁以上的老人。年龄老化、健康状况恶化等原因，使得这个最具代表性的歌册传承人群的数量锐减，处于极度濒危的状态。

林银花说：

现在想唱歌册，没有人听了，也没有同伴一起唱了，当年在姿娘仔间里的姐妹都已经不在人世了。^②

林橄榄说：

现在有时过着孤单，就希望有歌册可以唱。可是我当年收藏的歌册本都被搜出来烧掉了，很多歌词都记不得了。再说，唱了也没人愿意听啊。^③

2012年去世的蔡玩莲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者。2011年她在接受访谈时，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都很好，还能唱很多部歌册。仅仅过了一个月，她就因重

① 口述史料：陈妙云（1936—），女，汕头市澄海区溪南镇上岱美村，2012年1月调查。

② 口述史料：林银花（1928—），女，潮州市饶平县海山镇美宅村，2012年1月调查。

③ 口述史料：林橄榄（1935—），女，汕尾市陆丰市碣石镇新饶村，2013年2月调查。

度中风瘫痪在床，一年多后就去世了。蔡玩莲一生热爱唱歌册，她躺在病床上的时候，还靠哼唱歌册打发时间和缓解病痛。歌册是她的解痛药，成了她的生命绝唱。

传承群体的断层是歌册濒危的重要因素。在当前的商业化、网络化和多元化的社会环境里没有了产生新一代传承人的土壤，传唱歌册的文化生态环境也已改变。一部分老一代歌册传人也用听广播、看电视、唱潮剧等其他休闲娱乐方式取代了唱歌册。歌册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濒临危亡。

李逸贞说：

我几十年都没有大声唱歌册了，在哄小孩子睡觉的时候才会哼唱。前不久是在给曾孙女唱《百屏灯》的时候，让教书的外孙女听到，她才知道我会唱歌册。我以前真的很喜欢唱歌册，现在没有本子来看，就只能看潮剧。^①

目前，潮州仅有柯秉智和林少红2人在2008年被评为省级歌册传承人而受到保护和重视。林少红在被评为传承人后有机会公开演唱歌册，可遗憾的是她至今还没有找到新的传人。

林少红说：

我最喜欢唱潮剧，还差点成为剧团的演员。现在经常去表演唱歌册，潮州电视台还给我录了《百屏灯》。不过，现在叫我教唱潮剧的就有，教唱歌册的没有。邻居老人喜欢听歌册，他们总问我电台怎么没有播歌册的频道，就让我唱给他们听。年轻人都不喜欢歌册，他们听不懂。^②

五、结 语

潮州歌册的濒危现状是学术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多数研究者是从社会变迁、政治运动、观念更替以及经济、文化环境等外部因素去考察歌册的发展史。吴奎信认为，现代潮汕女性的思想观念变化和辨识能力不断提高，已经不再认同歌册宣扬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因果轮回宗教思想以及神仙鬼魂封建迷信思想，因此，与新时代不合拍的歌册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③ 歌册的创作者鄞镇凯认为，受众的大幅度减少，也磨灭了歌册作者的创作热情。随着

① 口述史料：李逸贞（1932— ），女，潮州市湘桥区新桥西路，2012年5月调查。

② 口述史料：林少红（1932— ），女，广东省级潮州歌册传承，潮州市湘桥区西新布梳街，2012年7月调查。

③ 吴奎信：《潮州歌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老一辈歌册演唱者和歌册作者逐渐逝去，后继乏人，歌册日渐式微。^①肖少宋在博士论文中也提到，造成歌册濒危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歌册本身的缺陷、接受群体的变化、社会环境的改变等，歌册走向衰落有其必然性。^②

然而，更需注意的是，某一种民间文化的兴衰发展可能就因为某一个群体的逝去而消亡。从女性个体生命的角度审视歌册的兴衰，不难发现女性的生命周期变化是歌册兴衰的直接原因，这是民间女性艺术发展无法回避的共同规律。歌册的兴衰随着女性婚前、婚后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尤其是受到女性生育状况的明显影响。绝大多数女歌手婚后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用于生儿育女，忙于家务。生养儿女平均要20年左右，她们大量精力几乎殆尽。兴盛时期的歌册影响了20世纪初到20世纪40年代出生的女性，她们就是歌册最具代表性的传承群体。当下，这群传承人已日渐年老、身体衰弱，是稀有的“歌册活化石”，她们的生存现状令人担忧。从某种意义上说，保护和传承歌册，让歌册能“活态”地生存和发展，当务之急就是要保护好民间仍然存世的原生态歌手。否则，歌册将随着这个传承群体的衰亡而彻底消失。

其实，多数民间艺术都与女性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歌册亦如此。

魏国英认为：

女性与民间艺术相得益彰的密切关系，在男主女从的性别制度和性别文化制约下，总是被人们忽略、漠视。即使在今日，在民间艺术研究不断深入、保护民族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呼声日渐高涨的新时期，人们也常常忘记对民间艺术的性别审视。^③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社会里，男尊女卑的性别权力划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贤妻良母的女性价值定位，决定了女性历史地位的低下。歌册成为中下层女性的休闲文化，并不是因为女性地位高而获得的“文化特权”，相反，是因为主流文化观念认为歌册俚俗粗糙，不能登大雅之堂，才被真正有文化特权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所鄙弃，“男子远歌册”正揭示了传统文化男尊女卑的实质。从性别文化的视角探究歌册的发展与女性生命史之间的联系，运用女性口述史的方法让歌册的传承主体——潮汕“婆娘”用自己的声音讲述属于自己的那份独特的文化历史，才能探寻到不一样的歌册兴衰史，

① 鄯镇凯：《再谈抢救潮州歌册》，《汕头日报》，2008年10月19日。

② 肖少宋：《潮州歌册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38页。

③ 魏国英、祖嘉合：《我的民间艺术世界——80位女性的人生述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

挖掘出歌册独特的女性文化特质。

鲍晓兰认为：

妇女口述史研究向男权文化为主导的传统史学提出挑战，将妇女置于历史的主体地位来研究，通过重视一向被忽视的妇女的声音和视角，以及她们在历史上一贯的主观能动性，来揭示形成社会性别的历史过程。^①

这34名民间歌册女性的口述历史记录了鲜活的女性个体生命史，不仅展示了热爱歌册的潮汕女性的生命历程，而且见证了歌册的兴衰历程。即便是她们的记忆因其个体化而与历史传统宏大叙事不相协调，但这是她们用个体的生命去感受、记忆和表达那段历史，以此呈现她们的个人生活史与歌册的历史变迁之间的关联。

^① 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口述史发展初探》，《浙江学刊》1999年第6期。